书而思

给后人留下信史

□李 乔

“知情度”极高的回忆录

童小鹏著的《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称《四十年》），是一部关于周恩来及相关史事的回忆录，时间跨度从西安事变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所记述的内容，既包括周恩来的史事，也兼及大量与周恩来有关的中共党史和民国史的内容。在这个时段发生的大事件几乎都写到了，与这些大事件相关的重要人物自然也都涉及了。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回忆录作为一种文体，既是史料之一种，也是广义史书的一种。回忆录主要以回忆史实为主，但有时也会兼有一些史事评说。《四十年》就是这样一部夹叙夹议式的回忆录。由于对周恩来史事的回忆和记述需要借助对历史背景的陈述才能说清，所以书中有很多对相关历史事件的陈述，因而《四十年》实际是一部回忆录兼史书性质的书。

回忆录的史料价值，首先决定于作者。童小鹏曾任毛泽东秘书、周恩来办公室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在周恩来身边工作长达四十年，无疑是最了解周恩来史事的知情者之一。他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不同于一般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更容易掌握第一手材料。史料学最看重“三亲”史料，即历史的亲历、亲见、亲闻者所提供的史料，童小鹏就是这种“三亲”者，这就决定了《四十年》必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书中所记述的史事，童小鹏大都是亲历亲见者，而他所亲闻的史事，许多又来自周恩来本人。

四美皆具的回忆录

史家对于回忆录所提供的史料，最看重四点：真实性、丰富性、细致性、稀见性。四美皆具，便是好回忆录。《四十年》就是这种四美皆具的好回忆录。

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蒋介石实施兵谏后，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到高桂滋公馆见蒋介石，书中写道：

周一进蒋住室，看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勉强欠身而起，请周坐下。周见到蒋面容衰老憔悴，满嘴没牙（上下都是假牙，在华清池逃跑时来不及带丢失了），难看得很，远非在当年黄埔军校的样子。周向蒋说：“蒋先生，我们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了。”蒋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抓住话题针锋相对地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的狼狈、无奈和架子不倒的派头，周恩来的坦诚和原则性，中共联蒋抗日的诚意，都活现和反映在这段记录中。这段记述的来源当然是周恩来本人，童小鹏只是亲闻者、记录者。但童能如此微观地记录西安事变的关键情节，这在西安事变史料中是不多见的。

孙铭九、应德田等少壮派搞“二二事件”，枪杀王以哲，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对于这段史实，以往的史书多记述简略。《四十年》则相当详细，如写：

当苗剑秋把周恩来生气的消息告诉孙铭九时，孙铭九知道他们犯了错误，就同苗剑秋去张公馆东楼向周恩来承认错误，并跪下请罪。周恩来要孙铭九站起来后，很严肃地责问孙：杀王以哲是谁搞的？孙说，是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等。我错了，请宽恕！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正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如此真切细致的记述，不亚于电影剧本。但电影剧本是文学，这段记述则是真史。

提供民国史人物史料

回忆和记述周恩来史事，必然要兼及民国史人物和事件。《四十年》记录了不少民国史人物的史实。许多内容都是以往不知道的。因而，这部书对于研究民国史也是有价值的。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以往史书大多只有囫囵的记述，宋在那些天究竟说了些什么，很少见到。《四十年》则记了不少。如记：蒋让宋美龄、宋子文与张杨、周恩来谈判，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并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都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动用武力。”可以看出，宋美龄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人物。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宋美龄的态度和表现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吗？这需要考证。《四十年》提供了一条重要史料。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有300多位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抗战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在会上，白崇禧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这条史料说明，蒋介石是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而且我估计还不是走马看花。因为当时的军事会议正研讨战略问题，蒋总要看一看共产党方面怎么说，看一看会打仗、懂战略的毛泽东怎么说。

为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作证

由于童小鹏对民国史特别是中共党史许多史实的知情度高，所以他所提供的史料常能起到作证和正误的作用。

重庆谈判是历史大事件，但其中不少内情世人并不了解，或是对一些历史情节各执一词。例如，毛泽东在谈判期间是否喊过“蒋介石万岁”，就是近年来报刊上经常说到和争论不休的问题。《四十年》披露了真实的历史情况。童小鹏说，国庆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举行鸡尾酒会，毛泽东出席，当时，自己带着相机想给蒋介石照相，但因戒备森严没照成。在酒会上——

毛泽东向蒋介石祝酒，毛泽东说：“蒋主席万岁！”引起全场中外人士的瞩目。

这段记述虽不长，但明确记下了毛喊蒋万岁的情节。童小鹏是在现场亲耳闻听的，所记无疑是信史，人们对此问题的争执可以打住了。毛喊蒋万岁，其实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当时为了满足人民愿望，和平建国，我党不记旧仇，豁达大度地对待昔日政敌，喊个万岁又有什么了不得。但蒋没有尊重民意，悍然发动内战，这是后话。

过去有一种传说，说陈毅被造反派逼着做检查，陈按当时惯例拿出《毛主席语录》，请大家翻开271页，然后高声念道：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造反派一翻书，哪有271页，全书总共就270页，弄得造反派很丢面子。这个传说流传甚广，但真伪难辨，看了《四十年》才知道，这完全是史实。当时周恩来在场，他给陈毅作证说：毛主席确实说过这句话。

又如，林彪整陈毅整得很厉害，但原因人们一般说得很笼统。《四十年》提供了一条材料。陈毅因对“文革”和林彪暴发户式的上升看不惯，有时说些讥刺林彪的话，结果惹得林彪很怨愤。书里写道：陈毅曾说，“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去他是我的部下。”要知道，林彪当时如日中天，如此奚落林彪，林怎能不恨？当然，林彪整陈毅，绝不仅仅因为某一句话，打倒老帅夺取权力才是根本原因，但陈毅讥刺林彪的话，却可能成为林整陈的直接动因。

历史照片的独特价值

历史照片是史料之一种，具有文字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四十年》有个很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史照多，特别是稀见的史照多。如蒋介石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的委任状的照片、国民党封闭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电台的照片、“大跃进”时土法炼钢的高炉和炼出的废铁渣的照片、庐山会议批彭后周恩来在庐山景区表情阴郁的照片，都是稀见的史照。史照之多，为该书史料的含金量增加了不少分量。童小鹏是个业余摄影家，书中的许多照片都是他拍摄的。他的存史意识很强，他把拍照片视为存史的一种好方法。

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照片极少。最有价值的一张照片是童小鹏拍摄的。《四十年》在记述庐山会议时，附上了这张照片。作者这样解释这张照片的来历：彭德怀检讨后，很多人发言，有些人推开藤椅站起来对彭德怀指着鼻子批。刘少奇当主席，还站起来当面批，并拍了桌子。很多人都吃惊地站起来看。我恰恰这次会上带了照相机，立即拍了一张斗争场面的照片。不仅是照片有重要价值，作者以目击者身份对照片的解说，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价值就在于它逼真地还原了历史原貌。

订正了一些讹传

《四十年》还订正了一些讹传。例如，有人曾著文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曾亲自上街卖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的《新华日报》。童小鹏说，这是讹传，没有这回事。实际情况是：当国民党顽固派扣下报纸，逮捕报贩后，周恩来气愤地对国民党官员说，如果不放人，我就和董必武上街卖报。国民党当局被迫放人。周拿回部分被扣报纸后，在途中散发给了路人。这个历史情节，很容易被误传为周亲自卖报。但有了童小鹏的辨误，实情也就清楚了。

把历史真相记录下来，把信史留给后人，这是童小鹏撰著这部书的追求和目的。《四十年》达到了这个目的。

书 摘

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李培林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在社会生活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网络化的情况下，国际国内面临的问题也相互影响和交织在一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流动加快，管理好巨大流动人口任务繁重。多数城市的农村进城的流动人口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体系，在户籍、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面临很多困难。进城流动人口多数聚居在城乡结合部和地下建筑，多数城市还是按照过去城市人口配备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也没有根据新的人口布局进行调整，往往造成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乡结合部的管理力量非常薄弱。管理好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涉及社会治理体制的方方面面，任务十分繁重。

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冲突持续增多。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又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比较突出。在土地增值成为地方经济重要推动力和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刺激下，新一轮“土地置换”形成热潮，大规模圈占农地和强行拆迁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增多，由此引发的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据统计，2006—2008年，在国家要求耕地占补平衡的情况下，全国耕地实际净减少12480万亩，年均减少近4200万亩，远高于“十五”期间年均减少2260万亩的水平。如何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非农化的过程中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防止和杜绝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件发生，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问题突出。我国初级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增劳动力数量在逐年下降，预计到“十三五”期间将会转变为负增长。与此同时，虽然理论上农村还有两亿多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但由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严重，农村老年劳动力与初级非农劳动力市场上的青年劳动力需求难以匹配，致使2004年以来间断出现的“招工难”问题常态化和加剧。在此背景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进入快速上升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也明显增强，不愿再返回农村生活和难以在城市留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原材料价格的提升和人民币的升值，都在压缩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和影响企业主的利益。在此背景下，当前非公有制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关系紧张问题非常突出，劳动关系冲突显化。因此，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协调好劳动关系，把劳动关系冲突纳入法制轨道加以规范、调解和处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基层财政力量薄弱，一些地方的基层干群关系需要理顺。在一些地方，基层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情况比较突出，各种需要地方财政配套拨款的社会事务较多，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严禁“乱收费”，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缺乏财源的情况下变换名目向群众收费的问题仍屡禁不止。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历届政府积累了许多社会问题，而基层往往容易注重当前政绩并遵行“今朝不理前朝政”规则，致使当前涉及基层干群关系的问题较多，甚至形成民怨。近年来，关于群众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出现从中央到基层逐级下降的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乡村空心化和凋敝现象，乡村产业空了，青年人走了，富人到城市买房居住了，干部也不在乡镇居住了。如何在新形势下处理好基层干群关系，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治理的大问题。

基层治理体制发生变化，需要重建把问题化解在基层的机制。我国社会治理的基础，过去比较依赖于工作“单位”，“单位组织”也是过去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机制。现在，绝大多数城镇从业人员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造成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治理的摩擦成本大量增加，自上而下社会事务的贯彻和落实，自下而上社会问题的调解和解决，都受到阻碍。基层发生的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现在无法“解决在基层”。对老百姓来说，“打官司”成本太高，而且相当一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而找基层政府反映诉求，现在又强调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所以越级上访、到北京上访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群众上访和地方政府拦截上访形成尖锐冲突。在一些地方，有些社会问题由于多年积累形成普遍民怨，很容易因意外事情造成群体性事件。所以，如何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形成有效的把问题化解在基层的社会机制，是社会治理体制需要探索的新问题。

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问题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正在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格局，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国家的特点：我国是在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基础上演变成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在这过程当中，分配状况和政策取向变化很大，民众对收入分配的看法分歧也很大；除了市场分配的差距，在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方面也有很大差距，如不同地区之间同级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不仅民众对分配差距过大的状况有意见，干部群体对目前的分配体制也有诸多怨言，而且根据调查，我国同一些收入差距客观程度相当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民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观不满程度要高得多；一些权钱交易和贪污腐败现象将贫富差距问题在人们心理上进一步扩大，造成一些“仇富”现象。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妥善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理顺收入分配的秩序，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必然要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这既需要勇气和远见，也需要智慧和社会治理的技术。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成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那么最大的尚未解决好的问题恐怕就是收入分配问题。

群体性事件问题突出，各种新型社会风险需要高度重视。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问题在群众中引起较大反响。尽管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大多数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反映的是民生和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如提升劳动福利和待遇、提高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抗议企业环境污染、追究医疗事故责任，等等。这些事件，有的属于侵害职工和群众利益造成的“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也有的属于社会普遍不满情绪的宣泄造成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难以预测、扩散迅速、容易引起大规模混乱的现代风险的特点，值得特别的关注。另外，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一些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事件，也多具有难以预测和容易引起民众恐慌的现代风险特点，需要高度重视。

摘自李培林《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版）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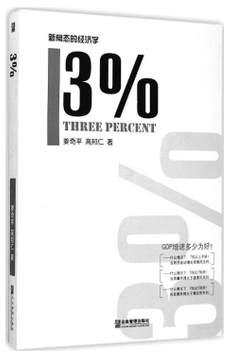


书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论述摘编（党员干部读本）》

作者：中共中央编译局/编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4月

编者谈书：本书按照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四大板块编排，可以为学习原著提供方便。全书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主要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历史地位和意义；第二部分是唯物论，主要讲哲学基本问题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第三部分是认识论，主要讲认识的本质及其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第四、五部分是辩证法，讲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及事物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性；第六至八部分是唯物史观，主要讲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人民群众与个人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这些论述比较全面地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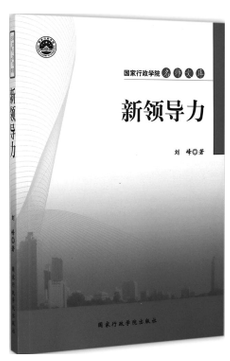
书名：《3%》

作者：姜奇平 高邦仁

出版：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年12月

推荐人：董光壁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推荐语：按我的理解，本书的核心概念是在书中被反复强调的“道”，贯穿全书的“自然率”是“道”的载体，并具体化为“3%”的隐喻。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本书讲的是“经济学之道”。这是中国“道器之辨”的传统说法，若按西方的学术传统，则应该称之为经济学的哲学问题。这就是本书的思想深度之所在。本书作者所倡导的“经济学之道”，就是以“天人合一”这一结论为背景的“中庸之道”，即增长的中庸之道、发展的中庸之道。



书名：《新领导力》

作者：刘峰

出版：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12月

编者谈书：现代治理能力离不开领导干部的新领导力，更离不开领导干部新领导力的修炼和提升。在本书中，作者根据多年研究所得指出，领导能力是领导干部从事领导工作应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包括战略思维能力、决策用人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等内容。新领导力是领导者对追随者施加并为追随者自觉接受的正向的、积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总体来说，领导能力是个静态的、相对狭义的概念，而新领导力则是一个动态的、内涵更广的概念，它包含领导能力但又不局限于领导能力。

“五多五少”读书法

□曾 锐

关于读书，笔者有自己的“五多五少”读书法。

少一些微阅读，多一些大阅读。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微博微信的普遍使用，人们可以随时阅读、随地阅读，并美其名曰“碎片化”阅读。笔者的感受却是，时间可以碎片化，但思维不应碎片化。“碎片化”的阅读，往往容易蚕食读者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往往容易干扰读者专注和持续的状态。因此，我们不否定充分利用时间的做法，但阅读还是要有固定的、专门的阅读时间。这样，阅读才能保证足够的专注程度和深入程度，彼此割裂的知识、观点也才能更好地联接起来、系统起来，成为理论、成为文化、成为精神生长的一部分。

少一些浅阅读，多一些精阅读。有一份研究报告对美国成功人士20岁之前的成长地区进行了统计，发现来自三线城市或者一线城市城乡结合部的人，成功的比例最高。报告认为，这是由于这两个地区既能便捷地获取信息，又使获得的信息数量适中，而大城市往往信息过于泛滥，导致人们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应该知道的，三线城市以外的地区信息量往往又不足。因此，越是信息充分，越要精挑细选，用有限的时间多看经典、多看好书。对于还处在工作成长、上升阶段或者时间有限的人来说，可能还需要多看一些和工作紧密相关的图书，原因很简单，阅读，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不能为了阅读而阅读。

少一些低阅读，多一些高阅读。一位朋友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他给自己的学习定了一个目标——“思考中国”。对此，笔者深以为然。我们通过阅读，不仅仅要增加对业务知识和技能的熟悉，更要掌握背后的逻辑、方法和思路。这样，阅读才会更有效果，更有深度。因此，不妨把阅读“站高一点”，多了解一些宏观大局，多读一些思维方式。胡耀邦说过，党员干部要懂全局、议大事、管本行，从阅读来说，同样如此。

少一些纯阅读，多一些写阅读。不动笔墨不读书。曾国藩的读书四法“看、读、写、作”中，写是指抄写、摘抄、提炼，作是指要写作、练笔。一本书，如果仅仅是读，哪怕读两遍、三遍，可能收获都是初步的，思考都是粗浅的。只有写读后感、写摘抄、写读书札记，只有梳理观点、提炼思想，只有通过对图书的再总结、再分析、再提炼、再深入，才能更好地感受作者、理解内容、掌握思想。而且，从笔者的阅读体验来说，写的过程，还是将他人的思考精华融会贯通为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写下来，写出来，知识和思想就成为自己的了，也就能内化于心了。

多一些集中火力阅读，少一些处处开花阅读。曾国藩给自己学习定了十二条准则，其中一条叫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我想，这是一种沉浸的读书方法。有的人身边到处放着书，床头柜、办公桌、卫生间，给自己制造出“总在看书”的幻觉，实际上，频繁地在若干本图书间转换，不仅读不好这些书，可能连一本书都读不好、读不深。因此，笔者主张，要能真正沉浸，才能真正获得，一本书没读完、没读懂，就不忙着去读第二本书。应该用集中的一段时间、一段精力，去读完、读好一本书。例如，每周“消灭”一本书，这样一年下来，比处处开花式的阅读可能数量和效果要好得多。

读书方法